DOI:10.6637/CWLQ.201912_48(4).0002

幻設轉向
「千禧年」之「喻」*

白瑞梅**

摘要

這篇論文處理兩部未完結的小說系列。一部是廣受好評的非裔美籍科幻小說家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地球之種》，又稱《比喻》系列。另一部是瑞典記者史迪格・拉森的《千禧年》系列，亦即全球暢銷的《龍紋身的女孩》系列小說。我將指出這兩部系列將女主角被賦權或奪權的敘事，連結到法西斯白人至上主義的歷史軌跡，揭示了自由西方世界的概念究竟為何。這些未完結的系列作中的旁若文學元素，讓故事整體得以破除新自由主義的現世所幻設的未來，以及冷戰結構下自由主義世界所幻設的過往。因此，這兩部系列標誌了我認為在當代文化生產與評論中出現的「幻設轉向」。我認為，這兩部系列針對近來被視為轉型典範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體制，具有相當的批判性；兩部並讀也突顯出幻設轉向橫跨了既有學術界域及地緣政治的性質。

關鍵詞：幻設小說，新自由主義，奧克塔維婭・巴特勒，史迪格・拉森

* 本文108年5月13日收件；108年11月20日審查通過。

**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中外文學・第48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9-51。

The Speculative Turn
Parables for the Millennium

Amie Parr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ading of two novel series: the *Earthseed* series, also known as the *Parable* novels, by Octavia Butler, a critically acclaimed Africa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novelist, and the *Millennium* series, aka the globally bestselling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novels, by the Swedish journalist Stieg Larsson. I argue that both series unpack the idea of the liberal West by connecting narratives of dis/empowerment for female protagonists to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fascistic white supremacism and racial capitalism. The para-literary elements of these arguably unresolved texts allow the narratives to unravel speculative futures for neoliberal presents and speculative pasts for the Cold War construction of the liberal. In this sense, both texts are emblematic of what I call a "speculative tur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riticism. I consider the two series as critical texts from nation-states that have been considered exemplary transitional models; reading them together shows how the speculative turn itself is formed across existing disciplines and geo-political sites.

Keywords: speculative fiction, neoliberalism, Octavia Butler, Stieg Larss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幻設轉向

「千禧年」之「喻」[*1]

白瑞梅

身為地球之種
被拋置於新世
首須領會
己身一無所知
——巴特勒，《撒種的比喻》（Octavia 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178）

「寫書是藉口，那麼真正的目的呢？」
——拉森，《龍紋身的女孩》（Stieg Larsson,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81；中譯本95）

奧克塔維婭・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比喻》系列（*Parable,* 1993,

* 謝辭：本研究計劃由科技部補助。本論文的最初版本發表於2015年多倫多美國研究年會上，修訂過後的完整版本發表於2017年十月國立臺東大學「轉向／重新定向：第二十六屆英美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此特別感謝兩場研討會中和我同一分會場的其他成員，以及許多聽眾寶貴的意見回饋。同樣感謝我的研究所專題課堂學生一同參與了令我驚豔，也對我助益良多的討論過程，以及方郁甄同學及時協助專有名詞的翻譯。同時我也感謝2017至2018年康乃爾大學人文學會駐校研究群成員，期間我們對於貪腐、透明度等概念的諸多對話都深具啟發。最後，我想再次感謝本期專題主編洪凌，匿名審稿人豐富、建設性的意見（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我也非常希望能將更多的建議整合進這篇文章，或是往後的版本中），特別是本文的譯者張竣昱仔細、良好的譯文，以及後續幾次修訂的耐心協助。

1 Parable既可翻譯為「寓言故事」，也是聖經的「比喻說教」之意。由於此系列書名來自於聖經內文，故選用「比喻」的「喻」。

1998）和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系列（*Millennium*, 2005-2007；英文譯本2008-2009），這兩部乍看之下驚人的相似處，在於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與種族主義追溯至二十世紀跨國企業的力量，一反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形塑出的歷史敘事。[2]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所發生的眾多事件之前就寫出這些作品，更突顯出新自由主義架構下，白人文化國族主義、國家權力、企業階級，與所謂中立的市場操作之間長久以來的聯繫。兩部系列作也都圍繞著女主角在身心理皆有缺陷的情況之下，獲得力量。故事中的她們使用自身的特殊能力時，不循著自己是無辜的劇本套路，而是呈現她們持續求索能力的運用及其效應。兩部系列突顯了主角，也可能是整個系列，對於賦權之倫理困境的階段性理解，包括了公開透明、個人自主、以及歸屬（belonging）等議題。[3] 在我對（後）冷戰政治／倫理道德良知批判性的比較閱讀中，上述的公開透明、個人自主、歸屬等都會被問題化，沒有簡單的答案；同時，這些問題也碰觸到西方在戰後自由主義下，酒井直樹所永遠延宕的、「假定的一體感」（putative unity）（180）。本論文將這兩部系列視為建立不同世界觀的旁若文學文本，探究其中的科幻元素除了稍微描繪出另翼想像的困難，更極富批判思考地將上述問題指向私有制，與促成不同程度自由

2　參見梅拉麥德（Jodi Melamed）詳解反種族主義一直以來對戰後美國自由主義演變的重要性。本論文之後談《比喻》系列時還會再討論她的著作。

布萊希（Erik Bleich）曾針對戰後美國、英國和西歐的種族歧視言論立法規範，做過比較研究。雖然自由跟反種族言論被定位成偶爾會「相互牴觸」的兩種「價值」，但Bleich指出美國的情況實際上隱含了「很少被公開認知的內在矛盾」，在他的比較研究分析框架裡被突顯。首先，美國在他研究的國家中，對於保障言論自由的執法程度最為嚴格，甚至還違反了國際準則，自二戰起「美國實際上**擴張**了種族歧視言論的自由」（6；粗體為原文強調處）。然而一旦一樁事件在法律上開始被理解成行為，而非只是為某個信念發聲時，美國在仇恨犯罪的相關立法也獨步全球：「相較於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其制定地更早，也更厲行」（12）。

3　關於「歸屬」與政治或哲學上的自由主義之間的關聯，參見瑞迪（Chandan Reddy）著作《暴力的自由》（*Freedom with Violence*）中的專章〈妮拉・拉森《流沙》中暴力的合法自由〉（"Legal Freedom as Violence in Nella Larsen's Quicksand"）。

化之法律等結構因素，以國家和／或個人權利之名，實則系統性地將財富重分配予經濟上層。

本論文中我會將小說中對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幻設思考（speculative thinking），與現行學術界對幻設小說的研究進行對話，以強調「旁若文學」作為一種理解西方體系在當代政治思想中造成的問題有其重要性。許多旁若文學的文化評論已經指出，科／奇幻是少數得以反省並突破「別無選擇」此等經濟現實論的再現模式。在非裔未來主義的部分，近來前所未有的大量研究專注於幻設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作為一種批判方式用以回應並介入種族資本主義衍生出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4] 巴恩（Aimee Bahng）於2018年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遷移未來》（*Migrant Futures: Decolonizing Speculation in Financial Times*）。書中論及處理幻設小說的難題，在於幻設（speculation）[5] 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金融制度的立基工具。[6] 巴恩認為「反幻設／反投機」（counterspeculations）（17）是來自「常識之下」（undercommons）的反實證主義知識形式，並在書中開篇即講明其立論前提：「旁若文學的系譜，讓我們注意到從資本主義之外的平行脈絡中迸發出各種新穎的文學形式及其意義，因而為超越資本主義系統的世界想像提供更多的可能」（20）。即便未提及旁若文學一詞，2011年法律學者思倍（Dean Spade）也在〈要求難以想像的〉（"Demanding the Unthinkable"）一文中，以類似的方式討論新自由資本主義現實論與科幻文學的關係（科幻亦正是「旁若文學」所涵蓋的文類之一）。思倍雖

4 相關研究可參見如Curtis Marez, *Farm Worker Futurism: Speculative Technologies of Resistance*，以及Shelley Streeby,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m*。

5 該詞原意有根據得到的資訊作想像推斷之意，在金融領域內又譯為「投機」。

6 關於此問題的相關研究，可參見Linh U. Hua, "Reproducing Time, Reproducing History: Love and Black Feminist Sentimentality in Octavia Butler's *Kindred*"（2011），編者未具名的合輯 *Speculate This!*（2013），以及2017年Sherryl Vint所編的*Paradoxa*期刊 *The Futures Industry*專號。套用巴恩的話來說，這本專書有很多篇幅也探究「幻設怎麼成為具基進性的開展形式，而非保護主義式一味地盼望」（7）。

然沒有在著作中討論幻設／投機分別在虛構小說和金融領域的兩面性，但他提出科幻擁有對社會改造工作重要的思想資源。他在書中聚焦於他認為有必要介入的兩件事，一是目前因愈行嚴厲的移民法而急遽惡化的種族及性別暴力問題，另一則是美國所採行的監獄工業複合體（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以同化策略進行階級戰爭。如同巴恩在其書中後段的主張，思倍指出此時此刻所要求的社會改造，在正式政策（formal policy）象徵性地涵納差異的情況下，總被認定為「不可能」與「無法想像」；而這種「不可能」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現實論的論述策略。思倍提到：「批判改造工作變得不可言說、前所未聞、難以辨析。政治可能被想像的範圍，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框架變得很狹隘、拘謹，「不可能」就成了唯一仍有創造力的領域」（1-2）。目前為數眾多且還在增加的研究，都將科幻和相關文類連結至批判新自由主義、投機金融、種族資本主義等等，上述所提的兩份研究是比較顯著的例子。我把這股在學術界與文化界的新興發展稱為「幻設轉向」（speculative turn）。

我認為就《千禧年》系列與《比喻》系列當中的科幻元素而言，兩部都有超越資本主義現實論的思考，一部分是因為源自於它們都攬起了對抗新自由主義經濟價值，此等「無法想像」的任務；同時，兩部作品也點出抬高自由主義以對抗新自由主義極端信仰的作法是有問題的。為了突顯這點，我會從民主制度上沒有完全奉行自由主義的東亞國家中，援引談及冷戰資本發展主義史的理論。這兩部系列作裡對於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諸多複雜的探索過程，我將其視為一種思考過程，嘗試跳脫冷戰後學術領域劃定的「西方／其餘」二元典範，例如比較文學研究將民主（粗略定義，但常常等同自由主義）與西方連結，而獨裁專制的國族主義（一樣是粗略定義）則與其餘的各地域連結。我認為這兩部以科幻進行世界建構的未完成作品中都提出了另一種時間觀與歷史觀，讓西方在自視為種族觀的進步者，擁護冷戰價值，以及代言新自由主義的劊子手這兩種角色之間，暴露出其身為一個連續體（continuity）所製造出的種種問題。以這種形式再現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等理念，即是針對被認

定為客觀，實則奠基於冷戰認識論本位延續至今的現實論典範，進行介入干擾。在〈科幻與正統文學〉，狄蘭尼（Samuel Delany）提出了大寫L起首的文學（Literature）／正統文學與科幻之分別；此分別有益去理解科幻敘事元素如何具有叩問現實主義範式的潛力。對於狄蘭尼來說，這兩群我們認知為正統文學與科幻的文本，其重要差異並非在於文類的分野本身，而在兩者之分野所形成的兩種差異性的論述。科幻論述與文學論述皆具有其相異的寫作與閱讀實踐。正統文學論述根基於現實主義的假設與正典之形構上。相反地，科幻論述肯認非現實的世界建構實踐。相較於由單一作者論著，且由大出版社出版的正統文學作品，科幻論述乃是由次文化的閱讀、寫作、出版社群形構而成（65-68）。我提議將此種狄蘭尼稱作科幻論述的社群實踐，作為一種介入後冷戰西方現實主義建構的可能性；實現上述的介入干擾，正是此刻旁若文學日益重要的原因，而在此之前少有論者意識到這一點。

「新自由主義」這個字捕捉到此批判性政治想像被資本主義現實論抑制而失落的狀態。但在此之前，長久以來已有論者對於一些具備質疑性卻又偏離正統現實主義及其世界觀的「文學文本」（literary texts）做出討論，試圖點出其所具有的理論高度。在1970年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對幻奇文學的形式主義研究（1973年英譯版）中，他認為幻奇文學在具顛覆力地懸置了後啟蒙實證主義帶來的可預測性（certainty）。而1972年蘇恩文（Darko Suvin）極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根據其六零年代晚期的演講所寫）則將科幻定義為「認知疏離」（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文類。如同蘇恩文受到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影響，狄蘭尼亦在七零年代末提出了新的針對科幻的討論。但重要的是，狄蘭尼是從科幻讀者和寫作者的社群出發，而非科幻本身的詩學問題，並且以社群中的動態互動過程，反駁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的「作者功能」和文學界認定的正典作品。狄蘭尼認為，不論是化為文字或閱讀實踐，科幻將小說建構世界的方式運用到極致。閱讀科幻與閱讀寫實作品不同的是，讀者無法先假設自己認識故事敘述的世界，他們必須把文字敘述

的世界和規則拼湊在一起；換句話說，讀者會被迫閱讀未知的事物，並了解到即便是一個簡單的文句，都有多種可能的涵義。[7] 這種閱讀實踐讓科幻和文本的世界有了思索推斷（speculative）的關係，也以同樣的方式潛在地和讀者身處的世界連結。

《千禧年》系列被歸類為犯罪小說，通常也不會特別討論其中的科幻元素。但如果就科幻小說對其他類型文學（包括主流文學）影響力日增的情形來看，不難理解這種將科幻類型元素嵌入報導寫實的情形。從拉森的生平資料就能看出他和科幻文學之間，有著相當明顯而持久的聯繫：自年少時期，他就非常熱衷閱讀科幻小說，甚至以科幻雜誌出版者的角色參與科幻寫作的社群。[8] 而本文並非以一般認知的文類理解「旁若文學」，而是將它視為一種**建構世界的模式**；這雖然源於旁若文學，但也擴散至其他主流的敘事形式。這種擴散的現象是旁若文學和近年來的幻設轉向中，很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面向。學術界雖然未將《千禧年》系列納入大寫的正典文學範疇，但它確實是市場認定的主流作品。若從上述狄蘭尼的論述來看，他在文章的末段認為，寫實作品確實可以用科幻的方式閱讀，也就是以非寫實的科幻閱讀模式解讀寫實。他也暗示這種閱讀模式，對文學的未來可能會是好的發展方向。而今看來，當時的他或許真有先見之明。

如果根據狄蘭尼論及科幻是一種論述實踐，而非一組具體的作品，

7　舉個狄蘭尼給的例子。「他轉向左側。」在一般的寫實文本中，這句話的意思可能是說一個躺著的人側個身子，科幻文本裡雖然也可能是這個意思，但也有可能他是個生化人或機器人，往左是幫身體的右側打開開關；又或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但故事還沒解釋，因此讀者先將不知道的事情留待往後，繼續讀下去。閱讀的過程中細讀每個句子，即便有些意思彼此相反，但保留句子潛在的多重涵義，最後將得到的資訊拼湊起來。（103）

8　參見彼得森（Jan-Erik Pettersson）所著的傳記資料，其中討論到拉森的這個興趣，延續至成年之後：「〔拉森〕是1980年北歐科幻協會（Scandinavian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的主席，任期一年，也是該協會期刊的主編」（21）。關於他對科幻的興趣及其政治立場的關係，見註18。

那麼我認為巴特勒和拉森的小說在建構世界的手法上，都運用了認知疏離的科幻技巧，以此批判一個將自身呈現為唯一可能的世界系統；因此兩人的作品對於當前政治思想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部作品也都試圖闡明以自由價值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闕漏。我認為這個一致性源自於一個具批判性格的「想像性遭遇」（imaginative encounters；Hortense Spillers的一篇論文標題，後續會再討論到）系譜。雖然巴特勒的科幻作品在這套廣闊的系譜中舉足輕重，但也不能以「作者功能」來簡化地認定其論述上的影響。而後文雖然討論了1990年代巴特勒筆下的蘿倫與2000年後拉森創造的莎蘭德這兩個角色的相似點，以及兩部系列中的其他相似處，然而這不必然就是巴特勒直接影響拉森的證據（雖然確實有這種可能性）。我認為，這些相似處即是上述「想像性遭遇」這個廣闊而跨越國界的系譜存在於幻設小說文化中的軌跡，同時也是冷戰之後試圖讓政治思維脫離自由主義底線（Chua）——亦即在墨守既有法規的倫理框架中，強化對個體及其權力有利的各種價值——的諸多嘗試之一。

一、（後）冷戰政治良知的密室懸案

> 「自從蘇聯解體後，歐洲興起一種新的**現實政治**。我們在辨識間諜方面的工作愈來愈少，現在多半和恐怖主義有關，要不就是評估某個地位敏感人物的政治取向。」
>
> 「這一直都是重點。」
>
> ——《直搗蜂窩的女孩》（Larsson, *Girl Who Kicked the Hornet's Nest* 131；中譯本108-09，粗體沿自中譯本）

拉森轟動一時的小說《千禧年》系列（2005-2007），在英語世界中較為人熟知的是其中的第一冊《龍紋身的女孩》（*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瑞典語原意為「憎恨女人的男人」）。[9] 小說的開場圍繞著一樁聲稱曾發生過的兇殺案。一名善於採訪金融貪腐案的新聞記者麥可・布隆維斯特（Mikael Blomkvist），在揭露一名身價十幾億的投機客所犯下的多起金融案件後，被控以誹謗罪。布隆維斯特在等待法院判他入獄前，暗地裡受雇於瑞典僅存的家族企業前CEO亨利・范耶爾（Henrik Vanger），從自己的近親中找出犯案兇手。范耶爾最愛的姪女，也最可能承繼其衣缽的接班人海莉（Harriet Vanger）神秘地失蹤，這起凶殺案幾十年來都未能破案。范耶爾當初因她的雙親失能，以收她為徒的方式救了她。這起凶殺案發生在范耶爾整個大家庭團聚期間，他居住的小島聯外交通被切斷；加上其他的因素，讓范耶爾確信兇手是他的親戚。在故事的前期，我們開始了解到這個所謂的模範家庭有家暴的前例，甚至在戰前和戰後長期參與法西斯活動。布隆維斯特在等待判刑期間開始調查，週遭的人都認為他收集范耶爾的家族史料是為了提供這位老去的家族族長寫自傳。正如駱里山（Lisa Lowe）點出這種模範人物自傳是自由主義重要的文類，這個「藉口」（pretext）在書中建立了一組范耶爾的人生與事業故事：范耶爾的企業雖已衰微，但在國家經濟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他將整個企業帶向領導地位，被稱為「這個福利制度完善國家的產業砥柱」（Larsson,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66；中譯本80）而為人所敬仰。

雖說寫自傳的藉口是為了掩蓋范耶爾雇用布隆維斯特的「真實目的」：找出殺害海莉的兇手，但其目的立刻就被島上的其他親戚所猜到。然而即便如此，這個謎團依然無法解開，直到隨著情節發展而轉變成另一個問題：最初推測認為合理的假設根本是被誤導的，因為范耶爾

9　關於標題翻譯和國際版書封設計隱含的行銷邏輯，參見Louise Nilsson, "Uncovering a Cover: Marketing Swedish Crime Fiction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此文記述了拉森在原版標題中呈現的政治態度，但出版商希望改掉，英文版標題則是在拉森過世後不久定案。其中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英語是幾百萬讀者的第二語言，英語文學和電影也通行全球。標題翻譯的選擇去掉了作品本身限於國內的框架，而將小說和電影和範圍更大的美國流行文化連結」（5）。

極具說服力的說法完全誤導了調查的對象。在前半部分，范耶爾、布隆維斯特，甚至讀者，都不曾想過當年的小海莉並沒有死，而是自己安排了一齣失蹤的劇碼。他們更沒有想到海莉殺了其中一位襲擊者，並逃過另一位的追殺，最後在澳洲內陸的一個放牧場當牧羊人，就像平行時空一般，在一個沒有人想像得到的地點與時空中過活。由此而言，布隆維斯特「真正的」目標，是在資本主義式的親密關係樣態中，進行「與過去不符的假設式」（past conditional）解讀（Lowe 40），將家族中的厭女情結和法西斯國族暴力，視為更大的、在現下時空中從未徹底被知曉之過去歷史的一部份。[10] 故事中當下的時間是海莉備受寵愛的哥哥馬丁（Martin Vanger）接任了CEO的職位，但實際上他卻是是連續殺人犯，而受害者多數都是移民女性，犯案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以上。布隆維斯特的工作成果，或是說拉森的這部系列，以橫跨二十世紀跨國經濟的規模，在這條基於現下時空重新劃設的歷史線中，改寫了家庭暴力的意義，並將當下時空遭遇這段危險、人命關天，卻未被直面肯認之暴力過往的時刻戲劇化。正如布隆維斯特從調查者轉變為受害者時所說：「**這不是陳年懸案。馬丁到現在還在殺害女人。而我竟然這麼一腳踩進……**」（Larsson,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417；中譯本423，粗體沿自中譯本）。

這樁案件之所以久久未破，是由於一位極受企業家受寵的姪女被認定遭到家族成員殺害。這個預先假設已經先破除家庭是避風港的迷信。然而隨著小說和整個系列的敘事發展，可以發現這整個事件將其最後目標限定於家族規模內作結事實上也是一種藉口，就和自由主義強調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說法一樣是個幌子。[11] 一開始「密室懸案」（217；

10 「〔借歷史學者史戴芬妮・斯莫伍德（Stephanie Smallwood）的用詞〕『過去可能會是如何』（what-could-have-been）蘊含著一種**與過去事實不符的假定時間**（past conditional temporality），巧妙地象徵著一種不同思維……企圖能包含歷史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實證方法，但也同時包含那些沒有切入方法、被不同的方法所糾纏混亂、甚至無法被任何方法所探求的事物」（Lowe 40-41；粗體為原文強調處）。

11 在此借用了蘿絲瑪莉・喬治（Rosemary George）從性別化的殖民性脈絡談家庭生活

中譯本102）般的認知，到最後卻被完全推翻。范耶爾最愛的姪女不僅沒死，甚至逼不得已變成殺人犯，而故事則以眾多女性的屠殺作結，她們甚至也不是受人尊敬的名家族范耶爾的其中一員。這些女性都是從東歐來的宗教少數移民，而東歐在故事開頭還被國家選定，成為以企業利益為核心而實行的金融投機計劃預定地區。除此之外，范耶爾家族中有一人以上參與犯案，故事中甚至暗示這些案件更大的程度和北歐戰前及戰後法西斯活動有關。這部看起來像是「會讓人沉溺其中」（217；中譯本223）的故事，最終原來是由冷戰資本主義、移民與人口販運、白種國家法西斯等過往的歷史**紛雜交錯**而成。而系列標題「千禧年」，其實標誌了原本結合社會主義國家福利、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觀，以及「自由主義式、以權利為本之個人保障」（Sejersted 8）的瑞典，目前已偏離了這個曾廣受推崇的北歐模式。[12]

這部系列的巧妙命名，也表明了媒體（尤指新聞報導）所扮演的角色。社民黨主導下的政治體制雖然放棄對媒體的控制，然而歷史學家和《千禧年》系列都認為媒體並沒有真正「獨立」，因為背後還有廣告商的利益和制度資源（Sejersted 442-43, 467）。2005年第一冊出版之前，2004年底拉森就已過世，他自己即是新聞記者，在一些合作計劃中調查白種至上和法西斯活動，甚至成為死亡威脅的目標。據現有的文字紀錄和訪談，拉森相信這些看似邊緣、地下、激進的右派集團，其實是整個

與個人主義興起，以及駱里山直觀地以親密性出發，觀察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如何在殖民史中被建構為個人生活的認可形式，亦即：「歷史發展的分野，將世界的發展過程分為兩種，一種發展出現代式的自由主體和社會生活，另一種則是被遺忘的，被打入失敗或無關的，因為它們沒能生產出可以被現代性所辨識的『價值』」（Lowe 17-18）。

12　在第三冊中有一故事段落聚焦在國安局憲法保障組負責人，其中包含了他對於言論自由（和限制）作為基本權利，關乎瑞典的「民主能否持續」（291；中譯本243）的省思。關於限制的部分：「立法的精髓主張的是沒有人有權利騷擾或羞辱其他任何人……。〔但報告已有利地聲稱〕幾乎不可能將任何人以違反族群仇恨法起訴並判刑」（291-92；中譯本243-44）。

瑞典社會重要的內在因子。這個說法的可信度，可以參照史學家厄斯林（Johan Östling）觀察1990年代至2000年之後，史學界在二十世紀瑞典納粹「經驗」研究上的典範轉移。[13] 拉森的長期研究讓他的小說具有歷史縱深與可信度。但除此之外，在暴露並挑戰新自由主義的一些自然化邏輯上，整個故事的科幻元素所具有批判力道，與其作為犯罪小說的報導寫實元素不相上下；這兩種文類並不衝突，都需要大量的研究為基礎。這些科幻元素包括了莉絲・莎蘭德（Lisbeth Salander，也就是書標指的紋身女）這個角色，科幻文本常有的駭客（莎蘭德的夥伴們），以及小說的形式風格。我會在接下來的篇幅，處理這些要素。

《千禧年》系列建構世界的方式，將當代眾多第一與第二代移民角色的命運，放進二十世紀納粹主義、白種至上、厭女問題等被詳盡探索的歷史中。這三部曲進展的過程中，原本熟悉的斯德哥爾摩城市地景，成為眾多角色的故事舞台。不論是他們的家、辦公室，甚至有時穿插著驚人的艷情過往，不供讀者臆測而將細節悉數展開，訊息量大得像科幻小

13 厄斯林的歷史研究涵蓋了一戰前和一戰後歐洲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便定位和理解瑞典的特殊地位，並將瑞典聲稱的中立位置歷史化。在導論中，厄斯林一反當代以野蠻原始（atavistic）的眼光看待法西斯主義，他強調其實在一戰前，這三者都可以被視作是現代思想，某種程度上有著同樣的系譜，也有著不同程度的相似度。「很多會讓現在的我們聯想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模式，並不限於納粹一類，而是更廣大的當代思想語彙的一小部分」（Kindle電子版338）。後續厄斯林在分析歷史學家諾博・高茨（Norbert Gotz）著作的段落中，他強調「儘管明顯地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其他意識型態選項相關，（瑞典模式，高茨視其為『自由民主之選項的代表』）組構出一個連貫的社會形式，與其它種社會形式有著根本的差異。然而，納粹主義一直以願景或幻想的形式競爭，同時作為挑戰和引誘，或明或暗的威脅」（Kindle電子版338）。接著認為這種存在形式經常被忽略，但對於理解歷史和當下情況非常重要。「納粹曾在1930至1940年代非常明顯地出現在瑞典，但它的支持人數有限，幾個主要的團體也沒有廣大的影響力。儘管如此，如果將其視為一種集體經驗，它依然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納粹在當年發揮的效果甚至比其他現象還大……因此，只要有政治意識，不論職業或政治傾向，即便說任何人都與納粹有關係也並不為過」（Kindle電子版417-24）。

說中常有的描述段落。[14] 如此緩慢卻引人入勝的敘事，鋪陳出莎蘭德有著相機般的記憶力和近似自閉症的症狀。在往後的故事中，我們漸漸明白這些能力／缺陷（(dis)ability）和特質，是前俄國情報員亞歷山大・札拉千科（Alexander Zalachenko）四散各地的孩子身上都有的，而莎蘭德有的只是眾多能力中的其中一種。「札拉」自俄國叛逃，投靠瑞典後成為告密者，後來成為犯罪集團首腦。他的存在不能洩漏，因此受到國家的庇護。札拉在冷戰期間備受倚重時，常常對莎蘭德的母親施暴，然而這些暴行卻被保安警察中的秘密部門掩蓋掉，因而札拉得以繼續為政府進行秘密工作。一次莎蘭德的母親被暴打幾近死亡，當札拉準備離去時，她點火引燃他的車。事後莎蘭德被認定「法定失能」，另外還須在成年後繼續被「受託人」的監督，才免除了被收容的危機；亦即她無法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權利保障，受託人也需要負責她的日常花費。故事中暗示札拉千科年輕時所加入的戰時實驗，應該意味著他們製造出常被提及的「札拉千科基因」（似乎也解釋了莎蘭德超乎常人的調查技能，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過人的體能，且感覺不到肉體疼痛的缺陷）。莎蘭德二十幾歲時，受託人覺得法律已認定她對週遭人有危險性，故不保護她。相較之下，自己則是個無不良紀錄、潔身自愛的律師。莎蘭德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虐待狂律師性暴力的受害者。受託人能夠利用她過去的收容和診斷紀錄佔便宜，也意味著她很容易被國家、社會，甚至自己，認定是瘋子或怪物。

《千禧年》系列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和核心人物設定，但我想指出的是，其中的敘事結合了幻設小說建構世界的手法和報導調查的風格打開了以往家暴敘事常有的「密室」典範。建構世界的敘事方式，讓被掩蓋的歷史和社會力量浮現，揭露了家暴，以及莎蘭德被媒體、警察、醫療及法律權威標籤為怪物的整個過程，讓她身上不尋常的能力、傷害，以及她的犯罪紀錄等等的意義去個體化。但同時這些答案又只是暫時的：不僅因為這些是日常表面下隱藏的驚人現實，也因為後續都還會有更深的

14　見Wolf, *Building Imaginary Worlds*，尤其是第一章的部分。

謎團被揭露，很多謎團又因為拉森死得突然，暫時沒有解答。這種不完整感更深化了在敘事上本就充滿晦澀、陌生化細節的敘事技巧，看似平鋪直敘的故事模式讀起來逼真，但卻讓某些熟悉而老套的主題（比如同理心），發揮預料以外的效果，關於這點後續我會再行討論。《千禧年》系列挑戰了將親密程度等同於人際之間的透明公開程度，挑戰了同理和誠實即為善的觀念連結，而這個思維也部份拒絕了從自由派的思維理解並解決它所呈現的自由或不自由暴力。

二、這世上沒有天真無辜的人，但有不同程度的責任

在《千禧年》系列的世界中，同理心不僅特殊，甚至可能是個問題。首先同理心在故事中，不同於以往用普世人文主義或自由的典範呈現，而是在整個新自由主義個體化，將疾病、失能、罪刑化等以人口統計的思維衡量的風潮中，突顯其稀有的地位。事實上，《千禧年》系列和《比喻》系列都將同理心呈現為一種特殊的，甚至是某種人工的特質；或者雖是殘缺，但在某些層面上有賦權的作用。[15] 這種特徵，尤其是有些角色有同理心，但為了自保，不得不維持冷酷或深不可測的態度，在當代的科幻和相關文類中非常普遍。雖然莎蘭德經常被其他位階高過她的角色形容為完全沒有同理心可言，但我認為她正是在科幻作品中展現同理心的典型角色。她在調查過程中展現的同理心並非只是情感的，更多的是在理智認知的層次上展現，反倒突顯她對於自己所調查的對象精準的情感描繪。此外，她詭異的能力可以「鑽進調查者的表皮底下」（Larsson,

15 我在2014年發表在美國研究學會（ASA）的論文中，將狄蘭尼的說法，和思倍針對科幻、移民的執法、監獄工業複合體的論文，放在一起並讀，探究當代的某部「新自由」科／奇幻小說怎麼處理同理。當時處理的文本是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的《冰與火之歌》系列，並一同參照HBO的改編影集《權力遊戲》。但我當時並非聚焦在有同理能力／缺陷的女性角色，而是著重分析幾個**缺乏**同理心的病態角色，例如年輕的喬佛里國王（Joffrey Baratheon），讀者則透過一位有貴族身分的侏儒蘭尼斯特（Tyrion Lannister）的觀點，並帶點幸災樂禍的態度教訓這些病態角色。這樣的態度，並沒有和同情（sympathy）背道而馳。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33；中譯本49），某方面而言駁斥了同理心必然和公開、互為主體、互相坦誠等特質之間的聯繫。首先，由於莎蘭德藉非法管道對他人資訊透徹的理解掌握，並以此威脅他人，使得她在別人資訊透明的情況下，必須依然保持不透明。儘管她只是個高中輟學生，又是最年幼的視點角色（POV character），但她對其他人的行動、背景、不為人知的動機，甚至是感情，跟其他在小說中本應更擅於此的角色（包括受專業訓練的調查人員、心理醫生、偵探、國安人員、老辣的間諜罪犯等等），相比之下了解地更為深入。她的神祕感以及她的過去、能力／缺陷，只有在一連串的謎團中才慢慢解開，對於前述的眾多專業角色，或對讀者而言皆是如此。這一點，與我在下個段落要討論的《比喻》系列一般，點出了公開透明並非為善。在情感的層次上，每當她密切理解他人的行動和動機時，除了情感上的同理，往往還有譴責；即便情感上同理，自己也會遭受到痛苦折磨。她對於他人的透徹理解，更多的是透過電子媒介而非人際互動，互為主體性的成份也相對較少。整部故事的推動是以莎蘭德入侵其他角色的資訊，並以這些資訊推理，足可見她從電腦獲取他人隱私的情節本身，就是小說建構世界的過程之一，也牴觸了自由人文主義下的角色特質和劇情發展。

最後，科幻語彙誘發的閱讀模式，得以將上述被問題化的同理心和單向透明，以及莎蘭德身上的怪物性，抽離出一般殘障、特殊才能、犯罪故事所預設的個體化敘事模式，而通常認證這些敘事的科學知識，是受過正規教育背景的專業階層產出的。她的角色光環將同理心的稀有，連結到更寬廣而深遠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但也讓性暴力批判脫離了新自由主義對良善公民與家庭的權利保護語境，甚至使這種語境在莎蘭德身上顯得相當狹隘：「假如〔莉絲〕莎蘭德是個普通公民，她很可能……立刻上警局指控……強暴」（210；中譯本217）。然而，「莎蘭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對她而言，警察是多年來不斷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敵對勢力。……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沒有任何住在郊區、受到保護的中產階級友人」（212-13；中譯本219）。

小說中大量描述莎蘭德和中產階級、郊區住民、警方之間的疏離，強調了她從來沒有，也從不可能被視為強暴的受害者，更無法考慮求助婦女救助中心，或是走一般的法律途徑。相反地，整部小說將她描述成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雖說這也可能意味著她的基因組成有問題，可能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無法感受疼痛的原因相似，但她確實也認為自己很危險，甚至有時會變得像怪物一樣。在敘事上，這三部曲呈現莎蘭德的驚人天賦時，未來感的描述逐漸增加，愈強化她超越常人的形象，如同科幻常採用的人物描繪和形容方式，比如她雖然嬌小得像個十四歲男孩而已，但卻像超級女英雄般不畏戰（直至第二部才因劇情需要而隆乳）。

莎蘭德不斷地和這種疏離，以及背後種種力量搏鬥的敘述，遙相呼應了法律學者思倍談到科幻和當代美國移民政策之種族歧視的關係時，他所提出的「『家庭』、『勞工』、『怪物』這三種象徵語言層次」（2）。《千禧年》系列建構世界的非寫實手法，呈現這種分類方式在強度升級的入罪化大業中，如何被生產運用。同時小說追溯極右翼國家主義，與橫跨歐洲各國的法西斯組織在瑞典的發展時，也展現了這種分類如何植根於反移民情結中。最後一部則在結尾以附記的形式，簡短提及瑞典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移民危機」（746；中譯本無收錄）。至此，我會在剩下討論《千禧年》系列的篇幅中，將這部作品建構世界的手法和閱讀方式，連結到角色在面對右翼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歷史的倫理困境，並討論《千禧年》系列呈現了冷戰之後，政治良知在碰觸到控制、監禁、正義的內涵等議題時陷入的僵局。

第一部以布隆維斯特起頭。他是一位有爭議但有成就、受人尊敬的記者，被控以誹謗，即將判刑入獄（「身為罪犯便是如此，他心想，置身於麥克風另一頭」〔9〕）。第二部則從莎蘭德開始。她是一個甚至在法律上沒有完整人格的少女，因為三名死者的謀殺案，以及媒體的大肆渲染，而被警方追捕。前兩部的劇情發展都從核心主角被判有罪起頭，描繪出兩位主角、法律、既有的倫理墨守法規，三者之間的關係，例如

將大型金融犯罪與女性家暴相連的環節。第三部以移民政策的相關軼事暫時作結（續集已在籌備中），突顯出這幾條反貪腐和女性賦權的故事線，都是以國家主義、移民問題、種族主義等相關事件背景闡發的。隨著莎蘭德和布隆維斯特的關係愈發親密，兩人在道德觀念上無可妥協的張力，以及在政治思想上的僵局，迸發出這段關係中的情感橋段。即便讀起來既奇怪又發展地不太完全，但我認為這個張力和僵局的戲劇化處理才是這整部系列的「真正目的」：布隆維斯特雖然至少年長了二十歲以上，但莎蘭德覺得他的道德觀實在太過天真（不管一個人對他人做了何等傷害，他都會對此人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迫油然生出自由派式的同情心）；相反地，她在認知上同理的表達方式雖然不太合法，但貫徹起來更加徹底到位，也非全然為善，正如藍道・威廉斯（Randall Williams）所形容的「不倚仗法律的清算」（non-juridical reckoning）（xxxii）。[16] 在這層意義上，「**莎蘭德原則**」（321；中譯本326，粗體沿自中譯本）這種反自由，或至少是非自由派的道德原則，成了《千禧年》系列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根據。[17]

對布隆維斯特（或許對讀者亦然），即便他所調查的地下法西斯活動愈來愈多地與資本主義史和經濟自由化有所關聯，但他還是只視這些活動為非法策動而已。作為一位左傾的金融貪腐案專家，即便要被關押，

16　雖然莎蘭德涉入的非法活動遠比布隆維斯特還要多，但兩人同樣都被法律嚴厲制裁。此外，雖然故事從布隆維斯特的判刑起頭，但隨著劇情發展，他的爭議報導揭發了許多人的犯法行為，包括從銀行搶匪，到有頭有臉的大企業家，不過他還是選擇隱瞞莎蘭德的秘密犯行，並在自己的調查中利用她高超的入侵技巧，挖出企業高層的貪腐行為。

17　莎蘭德被一間保全公司的人員雇用，調查並入侵布隆維斯特的個人電腦。他發現之後，兩人第一次見面，她解釋了自己個人原則的其中兩條。「你或許有興趣知道我也有你們道德委員會那類的原則。我稱之為**莎蘭德原則**。其中一條是混蛋永遠是混蛋，如果我能挖出一些狗屁倒灶的事來傷害一個混蛋，那是他活該。……不過重點是當我做私調的時候，我也會提出自己對那個人的看法。我並不中立。如果那個人看起來像個好人，我的報告可能會寫得溫和一點。……我本來可以寫一本關於你的性生活的書，也可以……提到艾莉卡曾經上過『極端夜總會』……〔但〕我若提到她，只會傷害你們兩人或是給某人提供勒索的題材」（321-22；中譯本326-27）。

他也戮力地想戳穿這群倚仗法律保護私產，得益於投機行為最多，卻仍犯下貪腐案的企業頂尖份子。但到最後，雖然他已經了解到白人至上和企業力量之間的關聯，卻還是回到自由派的基礎與法律秩序。莎蘭德與他截然不同，她的生命歷程和獨特**原則**，是在布隆維斯特最後無意間回歸的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之外形成的。她的原則是在她和一小群沒有太多交集的人之間，賦予不同程度的信賴感而逐漸形成的（這些人包括她的母親、社會學研究生兼情色愉虐服飾設計師但關係時有時無的女友、成員都是女性但已休團的金屬樂團「邪惡手指」、駭客朋友構成的虛擬社群、願意在系統內給予最大程度自由的前受託人、她的老闆德拉根・阿曼斯基、以及拳擊冠軍保羅・羅貝多、布隆維斯特）。這些角色在空間上和社經地位上的分佈不一。莎蘭德甚至幾乎沒有對他們透露自己的創傷過往和現在的法律地位。這些問題正如故事所強調的，沒有一點能與現有被認可的家庭型態相容，不論是血緣式、另組的，或是社群式的皆如此（唯一例外也許是「駭客共和國」，莎蘭德對其中的成員也最為坦承。但這個社群幾乎是以線上互動為主，偶爾涉入非法行為，彼此也幾乎不見面）。莎蘭德和這些角色的倫理關係幾乎都不是出自對家人或對國家的愛，也不是因為共同的利益。相反地，她將父母過世而繼承的財產全數捐出。除此之外，她在米爾頓保全公司的薪水也很少。她唯一一次的大筆收入是從網路上盜領一位劫財成性的億萬投機客的帳戶。她的個人財產和人際關係所奠基的倫理性很難被其他人一眼看透，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侵犯個人和侵犯家庭與財產是三位一體、相互連動的。對他們來說，她對正義的理解，和控管風氣、自命正義的暴力法西斯難以分辨。同時莎蘭德的原則，以及整個家內謀殺案如何被預想的方式及過程，都迫使書中角色與讀者看見這整個探案模式中所仰賴的、現行的倫理框架，暗含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議題。原本這種探案模式構想出的整個敘事和最後真相，是要逐漸發掘出背後的犯罪行為，卻沒想到在這個過程中，反而碰觸到合法性與私產制度的問題。

布隆維斯特與讀者只知道莎蘭德原則的其中兩條：第一，傷害女人

或其他弱勢群體的「混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是混蛋，即便用非法手段曝光也是活該；第二，對駭客而言，非中立性在判斷該曝光對方多少事情的時候是個重要依據，端看對方是否像個「好人」（不是混蛋）。莎蘭德基本上雖然接收了法律上定義強暴所仰賴的合意原則，但在其他問題上偏離了法律，以及對不涉及利害關係的客觀信念。雖然我們僅知曉兩個原則，但這也暗示還會有更多的原則。另一起事件也呼應了這種不完整感：莎蘭德曾被人恐嚇，要對她與其他女性不利，當時的她差點採取暴力行為報復對方；這種反應透露出她雖然一直想掌握「後果」的觀念及其重要性，卻也並不容易。莎蘭德原則未充分道盡，亦不知是否有所窮盡。隨後兩人之間的道德僵局，在認識論上，也在劇中情節引發各種弔詭的情形，更讓布隆維斯特眼中的莎蘭德，在當前的親密關係模式中顯得更加高深莫測。這些才是整個系列真正想處理的「密室懸案」。

當上述的這些弔詭情形成為閱讀焦點時，就能理解當今將「西方」視為一整組政治與社會價值的文化大業其不友善與危險性何在。《千禧年》系列可以從各種支持與自由化對立的政治立場進行閱讀，在此我會探索其中的兩個立場。布隆維斯特和莎蘭德對政治倫理的意見分歧，也在其他地方有所呼應：例如劇中諸多岔出的議題討論，像是瑞典憲法保障的權利與言論自由的本質。或者更具系統性例子：許多劇中角色，甚至可能連故事敘述本身，都在爭論「札拉千科俱樂部」是否代表瑞典國安局（SAPO）和整個國家，還是它只是個扭曲後的存在。對多數角色而言，一個有所運作的警方必然會維護民主價值，因而民主才能保護人民。但從莎蘭德對此絕不可能接受的態度而言，從她遭受到的對待來看，這樣的立場無法徹底解決故事敘述提出的問題。這些立場的張力在故事中完整地保留，也意味著從這兩方的立場閱讀《千禧年》系列都可行；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日趨嚴重的當下，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在於它開放這個問題的方式，得以對自由派提供的解決方案進行幻設層次的批判。

本文剩下的篇幅將討論巴特勒的小說《地球之種》系列，並追溯前述的歷史對接（將資本主義發展史接到個體化的理念及其敘述模式）和意識

形態上的解套（對於新自由主義入罪化效應的批評格局，脫離自由派對法治與私產保障的話語），這兩種手法在1990年代這個系列小說中的原型。前文提及，年輕時的拉森極度投入狄蘭尼謳歌過的科幻出版社群，[18]而這部系列作在拉森的圈子中也大受好評。但在此我比較著眼於科幻社群的重要性如何大過正典文學的建構，而非從一般文學建制所說的作家影響。作出這種推斷的緣由，一是基於狄蘭尼的文章，二是如同葛蕾絲・洪（Grace Hong）所敘述的「有色女性主義實踐」，對文本創作影響的所在之處及其方式，不見得都能被辨識肯認。[19] 像拉森筆下的莎蘭德，這種一部分從科幻文化中形成，卻廣泛地在各處出現的角色類型，可能已有系譜可循。這種可能性，讓我們得以用另一種眼光，理解瑞典和其他譯本出版商想改掉原標題「憎恨女人的男人」，拉森卻死命堅持的插曲（這部分有許多文字紀錄，尤其可參考Gabrielsson）。「婦女受暴」（violence against women）或許是源自小說所採用的集體強暴事件原型，而這個理解也正是基於社會事實，但卻成為了個體化之意識形態工具（將事件源頭和譴責歸咎於某些個體）的其中一個例子。然而，正如我在

18 利奇（Nathaniel Rich）在《滾石》雜誌的一篇人物側寫中，將年輕時拉森在科幻出版文化中的社群活動，連結到他的左翼立場與生涯志向：「在青少年時期，拉森就創立了兩份科幻愛好者雜誌，寫故事，寫文章，畫插畫。讀者可以寄自己寫的故事，或寫信給主編，當成一種支付雜誌費用的形式。科幻和政治之間的隔閡雖說本就一直不甚明顯，但當時可是七零年代，瑞典的青年運動已經到達了一種狂熱的高峰。雜誌常常會收到年輕的左翼份子來信，但當時有個例外：有位署名Lars-Göran Hedengård的科幻迷來信，激昂地為尼克森辯護，支持越戰。拉森不能放任這種言論不管。沒多久雜誌就被他對Hedengård的回應大篇幅佔據。後來愈來愈清楚Hedengård是個支持法西斯活動的活躍份子。拉森其實本來就有注意到瑞典的這些仇恨團體，但他非常震驚這些團體在他的同代人之間重新復活。他決心一定要曝光這些秘密運作的人群，他要變成偵探。

19 「發展式的敘事製造出對抽象的有產美國公民形象的認同，以及佔有式的個體，並將這種主體形構普遍化，讓個體之間的差異變得不顯眼。不同的是，有色女性主義實踐徹底地根除這種單一認同或普世主體的概念，〔並〕強調認同與不認同等各種軸線之間彼此的交會與競逐」（Hong xxvi）。

前文分析過的，《千禧年》系列反而花了大量的篇幅（雖非處處皆然），試著將家庭暴力（被一群只在乎單一議題的白種女性主義者推廣到全球），連結到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原本可能都會被模糊掩蓋掉的歷史發展。[20]

三、「生物性的良知也總好過沒心沒肺」[21]

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在一篇短文〈想像性遭遇〉（"Imaginative Encounters"）中，將科幻的重要性定位在它「詭異」地將「熟悉的與怪異的事物結合……以我們未知而未曾經歷過的方式帶我們回到原本熟知的事物」（4）。斯皮勒斯在文章中聚焦於巴特勒的作品整體，而她也從思倍所談的「不可能」和「難以想像」，討論巴特勒如何在作品中再現這兩個概

20　如同我在導言所討論的，思倍曾論及科幻對女性主義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在於新自由主義挪用社會運動的涵納策略下，科幻能讓我們敢於要求難以想像的事情。「反父權的政治計劃不斷地受邀或受誘進到『可能』的範圍，結果變成入罪化和帝國的正當理由。種種女人和酷兒族群生命的修辭被四處利用，在國內發起仇恨犯罪的立法，在全球輸出入侵他國的軍隊，建立並維持著施加種族與性別暴力的體系。還有，在諸多打著『女性』、『LGBT權利』的旗幟下運作，實則為種族歧視和同志正典的計劃，卻因為金錢援助、媒體報導、專業認可只認這些標語而大行其道」（Spade）。拉森的小說應是奠基於某一種女性主義的政治主張，用思倍的話來說，也就是可能「變成入罪化和帝國的正當理由」。女性受害者的形象貫串全系列，從新聞報導檔案、殺人犯日記中的紀錄，到屍體的照片、未成年少女裸體被家人性侵的照片，以及被噤聲販運的東歐女性和亞洲女性（拉森曾聲稱自己幼時目擊過一個女孩被集體性侵，時常提及此事是他創作此系列的動機。但也有可能這些女性就是這個女孩的原型）。這點正是此系列小說在種族和性別政治上站不住腳的地方，其一是讓其中少數、未被記錄的女性噤聲，其二是它的賦權方式，讓莎蘭德成為所有女人的榜樣與捍衛者。我把上述這些讀作是新自由主義式的賦權與涵納敘事作用在小說上的證據。這個力道，和前述思倍的分析、巴恩對幻設小說的專文討論，還有葛蕾絲・洪在《難以否認的死亡——差異的不可能政治》（*Death Beyond Disavowal: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的導論中，都指認出新自由主義欲結合社運的策略，兩者並行不悖。但同時，如同我在這篇文章的分析，這部小說系列再現了自由派正義觀的難題，也正是在對抗上述的邏輯。

21　出自《撒種的比喻》（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115）。

念，以突顯時間性（temporality）對於非裔未來主義（她自己並沒有使用這個詞，但這篇文章收錄在標題為《非裔未來女人》〔*Afro-Future Females: Black Writers Chart Science Fiction's Newest New-Wave Trajectory*〕的合集中）的重要性。她在討論巴特勒的小說《親族》（*Kindred*）時，談到書中回到奴隸時代之旅的情節，以及這種穿梭時空的旅程想像本身就讓人「難以想像」，說道：「但巴特勒甚至將它想像成小說體上最大膽的一步：如果虛構時間真的具有可塑性，那麼它必然可以前進，也能倒轉。」這段難以想像的思考／旅行之所以詭異，部分原因是它「拒絕了……前進的必然」，以及它強迫讀者從「偽造的天真夢境中」醒來：「我們不想知道自己在現實的存在是用難以計數的代價換來的」（5）。[22] 甚至不只是巴特勒的《親族》一書，眾多評論者包括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都有提到的《比喻》系列，已經是諸多針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學術研究對象。巴特勒在《比喻》系列中展現了她對整個社會和政治變化過程的研究和推演，像是刪除圖書館和學校等公共服務的預算、國家監視強化、日益嚴重的罪刑化、監獄大興、負債和私產剝奪的情形增加、氣候變遷，以及這些現象與種族資本主義及奴役的歷史。[23]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會探究《比喻》系列中兩條不同走向的時間性，一條是以科幻語彙，針對「新自由主義對冷戰悲劇的再製」進行反思。[24] 首先，在幻設式的過往這方面：我將女主角蘿倫的「過度同理症候群」，視為是在批判式地回應冷戰自由主義種族小說論述中「同理」所

22 在這個啟蒙後的進步時間性被當成自然的當今，斯皮勒斯除了劃出完全對反而「難以想像」的歷史之外，她對小說的閱讀方式也意外地應和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中的種族主義邏輯的相關理論。

23 有些研究將《比喻》系列視作對氣候變遷和新自由主義之批判性的幻設作品，相關研究可參見斯特里比專書中的章節：Shelley Streeby, "Climate Refugees in a Greenhouse World: Archiving Global Warming with Octavia E. Butler,"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ion*。

24 這個名稱沿自美國研究學會2016年會的一個分會場主題名稱，也是這篇文章首度發表處。

扮演的角色（Melamed）。第二，《比喻》系列正面對抗，並試圖超越後啟蒙傳統下，將封閉性視作實現烏托邦的條件（Jameson），重新思考共同體的未來。[25] 這種想像未來性的方式，一部分是立基於一種既必要，也可能反自由派的實用主義（Chua 192-93）。相較於另一群匿名作者稱頌其為「積極平權式幻設」（affirmative speculation）的想法，《比喻》系列以「在眾星之間生根」（84）這種看似矛盾的觀念模式所想像的未來，更往前推進了一步。

《撒種的比喻》開頭，女主角蘿倫・歐拉米娜（Lauren Olamina）以日誌的方式，敘述一連串的夢。一開始先從一場火燒房子的惡夢開始，之後慢慢敘述蘿倫和繼母的對話。繼母以西班牙文向她敘述自己從前看不見星星，是因為蘿倫沒見過的「城市之光」（5）。對話中蘿倫提及，即便沒有月亮而僅有星光，她也能很清楚地看見「社區之牆」。這種形容也許會讓人以為場景是在一個有警衛大門的普通社區裡，不過這種設想立刻就會被後續的語句打上問號：牆「是鄰近地方魁梧聳立，隱然令人不安的存在」，像是「既伏欲出的巨獸，與其說是給予安全，不如說是令人有壓迫感」（5）。當讀者在小說中進入後續的日誌，他們立刻明白剛才的那場夢是對整個環境的直白描述。這裡的科幻世界設定在近未來洛杉磯附近的一座小城，而非一般科幻設定的遙遠他方。但讀者已經必須從這個設定，從批判反省當下的眼光，閱讀他們尚且未知的事物。

小說中的南加州在氣候變遷和嚴重乾旱，以及國家驅使的種族暴

25　或者就像詹明信在《未來考古學》（*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一書中討論布洛赫（Ernst Bloch）時所說的：「在諸多隱蔽的話語及實踐中，找到突出表面的路」（3）。《才幹的比喻》（*Parable of the Talents*）中，「地球之種」這種不斷在變化的社群概念，可以讀作是將兩種對反力量的結合。一種是開創烏托邦式的衝動（開放、改革式的），另一種則是建立烏托邦式的計劃（封閉、革命式的）。在《撒種的比喻》（*Parable of the Sower*）故事開頭，蘿倫的至交及其家族放棄了日亦弱勢的飛地社區，選擇被收編進城鎮中，而她卻採取了「反－反烏托邦」（詹明信語，Jameson xvi）的立場，或可認為此處的設定已經體現了前面所述的對反。

力之下柔腸寸斷。國家並無介入緩和現況，警察和消防機關都因私有化過於昂貴，一般民眾無法求助。多數人口皆失業與無家可歸。水是相當稀有的商品。有些人更服用一種流行的新藥，變得特愛四處縱火，讓原本極盡乾旱的現況雪上加霜。僥倖佔據到房屋的人民須於社區周圍建立高牆，將其他人阻擋在外。否則像是沒有房屋，也沒有養護車輛費用的眾多人民，都必須以雙腳走上高速公路，成群結伴保護彼此，向北方逃去，即使北方早已對這些加州居民封鎖了邊境。在這樣的設定中，以蘿倫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說道：「我可以在不崩潰的情況下承受許多痛苦」（11），若說從故事先前已敘述過的痛苦情況來看，似乎就能理解這句話。但在下個段落，我們又讀到蘿倫談的是她自身的「過度同理症候群」，導致她僅看到他人受苦，就會在身體上受到同樣的痛楚，在童年時期甚至還會流血。小說中敘述這種情形的用詞是「同享」（sharing）。每當蘿倫遭遇到暴力或受難事件時，都必須承受這種超乎想像的痛苦，然而不論在她的世界或牆外世界，這些事件又相當普遍。小說以「過度」和「症候群」等字眼，標示出這種極度同理表現形式的不正常；如同《千禧年》系列，這也暗示著在新自由主義的圖景中，同理作為打破社會形勢的一種嘗試。

梅拉麥德（Jodi Melamed）的研究指出，「同情」（sympathy）在冷戰時期種族小說的論述形成中相當重要。美國雖標榜自由主義，並以此領導自由世界，但包括前蘇聯等國都指控美國在國內施行法西斯主義，以及奠基於奴役的種族化資本主義，而這些小說即如同證據（53）。梅拉麥德認為冷戰的「種族自由主義」運用同情，譴責白人至上，認為白人要為種族主義負責。然而它的方式是將這些主張個人化，例如閱讀種族小說（無論內容如何）可以即刻賦予白人一些認知，從心智意念上徹底轉變為反種族主義者，藉此也讓種族觀擺脫一些認定其已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這種論述，以及同情在其中扮演冷戰的協同角色，不僅不反對，甚至將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合理化，成為自由西方的反種族主義提倡手段（54-55, 62-71）。冷戰之後，新自由主義式的多元文化主義當道的

今時今日，反種族主義和民主依然和自由市場的理念掛勾，黑白二分的種族觀早已不復其當年的效力（42-43）。[26]

梅拉麥德在研究中爬梳了冷戰時期更具批判性格的小說。具同等批判性的巴特勒，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罪刑化、債務奴役等現象擴大的過程，在故事中演繹出美國資本主義的種族形構，是一種無法以自由派觀點解決的結構問題。巴特勒的科幻語言，一反現有研究多隱含了社會學式的現實論預設——將小說的形式視為文化的透明「窗口」。

種族自由主義中的同情心，中介層次過多又相當膚淺，而《比喻》系列中的過度同理症候群，得以讓蘿倫對他人的理解更深層也更準確，對於處在其社區牆外之人也是如此。隨著故事的進展，她運用這種能力高效地領導，收服人心。她偶爾會設想（但通常不會太久）如果所有人都有這種「狀況」，特別是有了能感知他人痛楚的能力後，世界是否能變得更好。蘿倫出生在一個曾為中產階級的混種家庭中（她的父親是黑人牧師，母親是拉丁裔，兩人都有博士學歷），成長於多為黑人的多種族社區中，父親因教會職位成為非正式的領袖。一天蘿倫的父親突然失蹤，雖然她還年少，仍須擔起父親一部分的職責。當其他社區居民對於當下的危機採取否定的態度，或是妄想有一天能回到「往日的美好時光」（例如九零年代，也是小說系列的寫作年代）時，蘿倫卻採取行動，進行應對，也說明她是優秀的領導人及思想者。由於無法逃避或忽視過度同理症候群讓自己遭受的種種痛楚，蘿倫最後決意要成立新的宗教「地球之種」。「地球之種」的信徒數量急速擴展，在第二部小說的尾聲，其中一部份的信徒甚至到外太空建立殖民地。雖然蘿倫的病症讓她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蘿倫卻也由此得以體會到諸多不同背景的人民所面臨的困境，但這種過度同理的呈現卻不同於自由派所定義的善，將暴力元素完全捨

26　在目前社會不平等被歸因為個人的失敗，而非整個系統運作過程一部分結果的當下，對於貧窮化與入罪化的諸多個體的咎責也愈來愈多。或許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製造出各個文化「專家」的過程中，遮蔽了這一點，使得冷戰建構出的同情所具有的慈悲善意，得以延續。

去：「小時候我不常打架，因為我會很痛。我能感覺我打的每一拳，就好像打在我自己身上一樣。所以當我決定要打架時，多是我主動打其他人，而不是像平常小孩互相打架。我打斷了麥可・塔考特的手臂和魯賓・昆坦妮拉的鼻子，敲斷了席薇亞敦四顆牙齒……」（11）。和前述的善正好相反，蘿倫甚至在這段日誌中認定其他角色（可能包括讀者）可以理解這點。在小學時她就有了這麼多的暴力紀錄，而且全都是事前盤算過的，但卻也都是出於自我保護或保護他人，就像預言了往後大眾所熟知的莉絲・莎蘭德。[27] 而且這種暴力傾向還延續到成人階段：「我將他人一擊斃命，因為我覺得如果只是讓對方受傷，自己根本承受不了那種痛」（278）。此外還有一點和莎蘭德一樣，當蘿倫用過度同理的能力透視他人時，也沒有公開透明性可言。事實上，正因為這種能力會讓蘿倫相當脆弱，她才對近親以外的人隱瞞，並且習慣維持冷酷的面貌。

《比喻》將人際之間的公開透明所預設的可能性及可欲性複雜化。加之，小說運用了科幻的語彙，更拒絕了一般認識論層次上的公開透明。此外，蘿倫講求實際的宗教哲學，也直接拒斥了現下時興的「別無選擇」式新自由主義經濟現實論述。蘿倫和跟隨她的人相信「上帝是因著被人塑造而存在。一定還有我們能做的事，還有更好的命運能由我們塑造」（76）。這種共享式塑造的見解來自於她廣納百川式的哲學思維，不斷地見於書中各處：「所有你接觸的，都被你改變。所有被你改變的，也都改變了你。上帝，就是改變」（195）。這種哲學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它對於改變的著重可以連結到以往的一些哲學思想，包括從佛教到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例如，皮爾（Ellen Peel）就認為這套思想沿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實用主義傳統。皮爾將小說哲理中的改變，讀作小說要教導讀者的觀念，也是對女性主義的貢獻。

27 蘿倫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展現出她拒絕同情。當她向她往後的未婚夫透露病情時，他一剛開始以人文主義的方式比喻，說如果所有人都有這種病的話再好不過，試著以體貼的方式不理會病情帶來的失能結果。但蘿倫卻回應道：「我不是要聽這些恭維或安慰的話，我要你去理解體會」（278）。

這個概念當然是多種思想混雜後的表達產出。但如果將其放回全小說系列的政治綱領中——亦即從當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與社會進程推演出的一樁故事——便可知「地球之種」系列的作品力度，在於它挑戰了自由主義所框設的解決方案。瑞迪（Chandan Reddy）曾形容這種解方的思維，是將一些持續成形又變化的情況，歸納成明確而固定的脈絡。[28] 而《比喻》系列阻礙了這種思維運作。在《比喻》系列中，這些情況不斷地變動，跟社群有相互形構的關係，而非將其固化成一個界定明確的社群及環境脈絡。地球之種的教義肯認了這些情況的存在，重視它們帶來的諸多可能性，即便這些情況可能難以接受或令人不安。地球之種在往後人數不停地倍增，規模超出一般的社群樣貌，而非侷限於第二部小說描繪過的定點發展型態。這種情況是必然的，也被認為是實際的，但這種實際的精神已然捨棄了私產觀念與固定的領域觀。

社會學家蔡明發（Beng-Huat Chua）曾提出「反自由的實用主義」（illiberal pragmatism），這個概念是用來形容冷戰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脫離自由主義的狀態。然而對已發展國家和英語社會學界而言，這種概念讀起來就只有在科幻小說中才會實現。他舉新加坡執政黨為例，它採行現代化、多元主義、民主選舉的同時，卻沒有行自由主義的政治態度，令人難以捉摸；蔡明發以此例說明冷戰將現代性、民主和多元主義等概念鑲嵌進自由主義（185-87）。蔡從社會文化理論闡釋：同樣在美國領導，梅拉麥德也曾討論過的自由主義冷戰軌跡中，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機構在實用性的層面上，將民主斥為是反發展的，並解釋民主是如何在這樣的景況下運作。然而，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現實論的脈絡中，可能還需要一部幻設小說，從當代自由多元主義的陷阱中，將策略性而有活力的實用主義解放出來。在這個層次上，巴特勒在這部系列中所做出的新自由主義批判，對於叩問自由西方世界在冷戰中劃設世界的方式，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

28　見其專書《暴力的自由》（*Freedom with Violence*）導論，尤其6-8。

四、「我寧願能仰望星辰」[29]

地球之種的使命
便是在眾星之間生根

是在新的地球上
生活並繁衍

是化為新生
思索新的疑問

是探索廣袤無垠的天際

是探索廣袤無垠的自己（Butler, *Parable of the Talents* 276）

地球之種——在閱讀過程中作為一種思想工程——確實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的方式；正如狄蘭尼所說，科幻迫使讀者認知到他們對於被描述的世界並不全然了解：「身為地球之種／被拋置於新世／首須領會／己身一無所知」（178）。一如我在前文所述，《地球之種》系列作為一部幻設式地遭遇過往歷史的故事，在當代梅拉麥德所述的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籠罩之下，處理了種族自由主義及其殘存餘毒的歷史生產過程。同情在自由派反種族主義中之所以舉足輕重，其實是奠基於種族小說的寫實表達：即，不論歸類於何種文類的小說，其中必定包含了原汁原味的種族訊息和知識（Melamed 63）。雖然就整個文類而言，巴特勒幾乎是以毫不掩飾的寫實手法寫就這部系列，但她的科幻書寫也消解了小說敘事固

29　出自《撒種的比喻》（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6）。

有的寫實元素。它拒絕了既有的知識理解、以往由國家調度提供的解方（例如企業城鎮、契約奴工），以及現有的社群及歸屬觀念。在最後這簡短的結論裡，本文將探究這部小說如何想像未來社群「被拋置於新世」，拋棄以往的知識，以及這實驗性的一步怎麼變成這部科幻小說的實際**場景**（而非外太空殖民地所想像的最後藍圖）。

雖然這部系列通常被認為是反烏托邦的故事，許多研究者還是將故事中的「橡實」社區[30] 視為一種烏托邦。[31]「橡實」是第一部小說中的最後，地球之種所建立起的一個社區，最後被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執政黨代理人毀滅，成年人變成奴隸，幼年人則被另置於基督教背景的關懷之家。蘿倫在創立地球之種前，當她和夥伴們前往北方時，她頭一次向他們提起創立這個宗教的構想。她曾解釋，這個宗教的最終目標是選定新的世界：「我覺得我們必須像個種子一樣，離這塊將亡之地愈走愈遠」（79）。換言之，這個宗教的「使命」就是要「於眾星之間生根」。這種對未來的圖景意味著對過去，甚至對現下（「將亡之地」）的基進否定，也並非期待最終會有一種「根深蒂固」，而是永遠移動前進（愈走愈遠）的持續性過程。斯特里比引用了詹明信的討論，並注意到在批判性的反烏托邦文本中，這種將最終目的地或最終目標往後推延，是一種「烏托邦眼界的閃爍微光」（Streeby, “Speculative Archives” 34）。對於斯特里比而言，這種閃爍微光代表持續不斷的鬥爭，去想像並建立另翼的、多種族的社群。即便勝率極低，小說本身和書中角色也都不輕言放棄這種鬥爭。

我想強調的是，除了前述提及的短暫定居於橡實社區之外，這種眼界或目標在整個故事中，並非只是一個向前標出一個最終地點，而是從一人所立之處所拉出的遙遠距離，就像故事開頭的夢境中所描繪的星星

30　名稱可能取自英文諺語「萬丈高樓平地起」：“Great oaks from little acorns grow.”

31　對於烏托邦相關說法的小說批評，參見皮爾（Peel）。皮爾自己稱其為「實用烏托邦主義」（pragmatic utopianism），並提及以往烏托邦的觀念常被設想為靜態穩定（static）的。另參見斯特里比將巴特勒視為是「空間理論家」的相關研究（“Speculative Archives” 33-34）。

一般。對詹明信而言，如同先前斯特里比談過的，啟蒙後的烏托邦也必定是一種**飛地**（enclave），仰賴一體化的封閉力量，分化出內與外、「我們」與「它們」等。這些小說所再現出的飛地社區（有圍牆的羅布雷多和橡實社區），雖然沿用了社區和歸屬的觀念，但小說除了以欲望的角度描繪，也同時將這些觀念以問題化的方式呈現：兩種東西都是「虛假安全」（false security）的來源，而羅布雷多社區也相當不智地立足於特定的倫理典範，作出人與非人、良善與邪惡、值得與不值得的人事物等等區分。然而這種烏托邦想像的基進之處，並非在於蘿倫的夥伴試圖建立一個不同於此的社區，而在於這種未來感十足，卻尚未形成的社群，在第二冊的推進中，並沒有給定一個實存的地點或領土。地球之種已然「無產」（propertyless），因此蘿倫與其跟隨者開始建立新的「公社」，不等同也不被特定的「在地」（local）所束縛（Berlant 3），隱約地向更遠更廣之處擴散。最後我想以一則類比作結：地球之種不基於私產，而以「公社」為模式擴散的方式，正具備了幻設小說語言所具有的運動和衝撞特質。去冷戰政治思想計劃（Chen）企圖超越自由主義認定的價值及可能性，而幻設小說的語言特質正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引用書目

Bahng, Aimee. *Migrant Futures: Decolonizing Speculation in Financial Times*. Durham: Duke UP, 2018.

Berlant, Lauren. “Introduction: Compassion (and Withholding).”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Ed. Lauren Berlant. London: Routledge, 2004. 1-13.

Bleich, Erik. *The Freedom to Be Racist?: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truggle to Preserve Freedom and Combat Racism*. Oxford: Oxford UP, 2011.

Butler, Octavia E. *Parable of the Talents.* New York: Grand Central, 1998.

——. *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 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00.

Chua, Beng-Huat. “Towards a Non-liberal Communitarian Democracy.”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184-202.

Chen, Kuan-hsing.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Duke UP, 2010.

Delany, Samuel. “Science Fiction and ‘Literature’—or,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 1984.

Starboard Wine: More Notes on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Fiction. Rev. ed.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P, 2012. 61-81.

Gabrielsson, Eva. *"There Are Things I Want You to Know" about Stieg Larsson and M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12.

George, Rosemary Marangoly.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Berkeley: UC P, 1999.

Hua, Linh U. "Reproducing Time, Reproducing History: Love and Black Feminist Sentimentality in Octavia Butler's Kindred."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44.3 (2011): 391-407.

Hong, Grace Kyungwon. *Death Beyond Disavowal: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2015.

——. *The Ruptures of American Capital: Women of Color Feminism and the Culture of Immigrant Labo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6.

Jameson, Frede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Durham: Duke UP, 2005.

Larsson, Stieg. *The Girl Who Kicked the Hornet's Nest*.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and MacLehose, 2009.

——. *The Girl Who Played with Fire*.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and MacLehose, 2009.

——.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and MacLehose, 2008.

Lowe, Lisa.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Durham: Duke UP, 2015.

Marez, Curtis. *Farm Worker Futurism: Speculative Technologies of Resistan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6. Kindle.

Melamed, Jodi. *Represent and Destroy: Rationalizing Violence in the New Racial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1.

Nilsson, Louise. "Uncovering a Cover: Marketing Swedish Crime Fiction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7.1 (2016). 3 July 2017.

Östling, Johan. *Sweden after Nazism: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Wak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rans. Peter Graves. New York: Berghahn, 2016.

Peel, Ellen. "'God Is Change': Persuasion and Pragmatic Utopianism in Octavia E. Butler's Earthseed Novels." *Afro-Future Females: Black Writers Chart Science Fiction's Newest New-Wave Trajectory*.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8. 52-74.

Pettersson, Jan-Erik. *Stieg Larsson: The Real Story of the Man Who Played with Fire*. Trans. Tom Geddes. New York: Sterling, 2011.

Reddy, Chandan. *Freedom with Violence: Race, Sexuality and the US State*. Durham, NC: Duke UP, 2011.

Rich, Nathaniel. "The Mystery of the Dragon Tattoo: Stieg Larsson, the World's Bestselling—and Most Enigmatic—Author." *Rolling Stone*. 5 Jan. 2011. Web. 18 July 2018.

Sakai, Naoki. "The West—A Dialogic Prescription or Proscription." *Social Identities* 11.3 (2005) 177-95.

Sejersted, Francis. *The Age of Social Democracy: Norway and Swed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Richard Daly. 2005.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1.

Spade, Dean. "Demanding the Unthinkable." *feminists@law.* 1.1 (2011). Web. 23 Oct. 2014.

Spillers, Hortense J. "Imaginative Encounters." *Afro-Future Females: Black Writers Chart Science Fiction's Newest New-Wave Trajectory*.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8. 3-5.

Streeby, Shelley.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ion*. Oakland: U of California P, 2018.

——. "Speculative Archives: Histories of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49.1 (2014): 25-40. Web (Project Muse). 15 Sept. 2015.

Suvin, Darko. "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College English* 34.3 (1972): 372-82.

Uncertain Commons. *Speculate This!* Durham: Duke UP, 2013. Kindle.

Vint, Sherryl. Introduction. *The Futures Industry.* Ed. Sherryl Vint. Spec. issue of *Paradoxa* 27 (2017). Web. 29 May 2017.

Wolf, Mark J. P. *Building Imaginary Worlds: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Subcre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